

[旧版文章](#)[天人古今](#)[古今通论](#)[古代通论](#)[世界史论](#)[当代三农](#)[现实问题](#)[旁通类鉴](#)[先秦史论](#)[先秦通论](#)[原始经济](#)[文明起源](#)[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汉唐史论](#)[汉唐通论](#)[战国秦汉](#)[秦国秦代](#)[西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史论](#)[宋元通论](#)[唐宋通论](#)[北宋南宋](#)[辽金西夏](#)[蒙元史论](#)[明清史论](#)[明清通论](#)[明代通论](#)[明中后期](#)[清代通论](#)[清代前期](#)[近代史论](#)[近代通论](#)[清代晚期](#)[民国通论](#)[民国初年](#)[国民政府](#)[红色区域](#)[现代史论](#)[近世通论](#)[现代通论](#)[前十七年](#)[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学科春秋](#)[学科发展](#)[专题述评](#)[年度述评](#)[学人学术](#)[学者小档](#)[理论方法](#)[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 [疑古与走出疑古之争](#) /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1) ——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1)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1) ——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1)

2004-10-24 吴少珉 赵金昭 等 旧版文章 点击: 1152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1) ——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1)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1) ——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第四章第二节 (1)

作者: [吴少珉](#) [赵金昭](#) 等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2-2 23:06:42发布) 阅读288次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主编

张京华 张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四章 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嬗新: 对古史辨派作用与局限的检讨

第二节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顾颉刚疑古思想的形成, 深受胡适“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方法的影响, 他们破除了对古代圣人和经书的迷信之后, 对传统的上古史和古典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要求对它们进行全面的理性的审查。周予同评价道: “‘疑古派’在中国史学史上自有其不可一笔抹杀的业绩, 他们继承今文学的思想体系, 采用古文学的治学方法, 接受宋学的怀疑精神, 而使中国的史学完全脱离经学而独立, 这在中国学术演进史上是不能不予以特书的。”但又指出其存在的缺点: “他们的史料限于记载的书本, 他们的研究方法仍不免带有主观的成见, 他们的研究范围仅及于秦、汉以前的古史以及若干部文学著作, 因之, 他们的成绩不免消极的破坏多于积极的建设。”[1]裘锡圭也指出疑古思潮的贡献: “从20年代到30年代, 疑古逐渐成为古典学界的主流思潮, 传统的古典学在很多方面受到清算。经书的神圣外衣完全被剥除, 很多先秦古书的年代被推迟, 有不少书被看作汉以后的伪作 (这里所说的书包括书中的单篇)。虽然怀疑古书之风早就存在, 但是只是到了这一次才发展成主流思潮, 怀疑的广度和深度也大大超过以往, 从而明显地改变了古典学的面貌。”[2]

不可否认的是, 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往往大胆假设有余, 而小心求证不足。如他根据《说文解字》提出的禹是一条虫的论点, 就显得相当草率, 几乎没有任何证据, 仅凭主观想像: “我以为禹或者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 当时铸鼎象物, 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 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 或者有敷土的样子, 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3]这里他用了不少含糊的词语, 如“以为”、“一定”、“或者”、“就算”等, 都是猜测之语, 并没有做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事实上, 他之所以研究古史, 目的是为了改变前人建立起来的今不如古的历史观念。近数十年来, 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 已经为古书真伪的辨别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古书形成年代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李学勤说: “晚清以来, 疑古思潮的副作用。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的进步意义, 我认为予以肯定, 在学术发展史上, 这一思潮也是有重要贡献的。不过, 他们的疑古有时过了头, 造成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 其影响是负面的。这种影响在海内外都相当大。近20年来, 各地考古工作中发现了大量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佚书, 经过学者们整理研究, 证明‘疑古’思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潮中的‘辨伪’，有好多是不正确的。”[4]

古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伪书的种类有以下几种：古时并无其书而后人假名伪造的；原书已久佚而后人有意作伪的；原作者已无考而后人托名前人的；成书较晚而相传为前代著作的。历代学者对辨伪工作有不少贡献，朱熹主张“精思明辨以求真是”，提出从书的来历、思想内容及文章体例等方面进行考核。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把考查伪书的方法总结为八点：“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又作了补充和修正，此外他还著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所言辨伪方法更为详密。

余嘉锡撰有《古书通例》，对古书的形成及演变作了极为详尽的说明。他总结道：“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皆后人所妄增。”“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书名。”“古书皆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约而言之，则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既欲明其学有师法，又因书每篇自为起讫，恐简策散乱，不可无大题以为识别，则于篇目之下题曰某子，而后人以为皆撰人姓名矣。”[5]

近数十年来，考古资料发现和学者们所做的文献整理、考辨工作，特别是出土的竹书帛书对研究古书体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新成果，推动了学术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对古籍形成过程的认识，古书的体例一般为：（1）古书不题撰人；（2）古书多无大题，而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3）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4）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5）古书往往分合无定；（6）古书多经后人整理；（7）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8）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6]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情况值得注意：（1）佚失无存；（2）名亡实存；（3）为今本一部；（4）后人增广；（5）后人修改；（6）经过重编；（7）合编成卷；（8）篇章单行；（9）异本并存；（10）改换文字。[7]古代并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装订的书，所谓“书籍”都写在竹木简板或绢帛上，容易增改变更，古人又不注意版本问题，抄写传授时改动是常有的事。因此，如果发现一两句话只能在后代才可写成，也只能说明那一两句话是后代写的，决不能证明全篇或全书都著于后代。古代子书大都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门弟子或后学增益的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等内容。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有些篇与《管子》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的《七发》、《参思》、《地图》等篇，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袭用、割裂《王兵》篇的。这对于了解《管子》的成书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古代算术、方技方面的著作，也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为依据，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如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可以视作《黄帝内经·灵枢》中的《经脉》篇的祖本，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即后来《九章算术》的源头。第二，有助于对古籍真伪的辨别和时代的判断。如今本《六韬》、《尉繚子》、《晏子春秋》、《鹖冠子》、《文子》等书，都被前人判为伪书，但在银雀山和马王堆汉墓中分别发现这些书的部分篇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同。一种书从写成到流传，总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些书的著作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说明《老子》成书的时代最晚也晚不过战国早期。所有这些新发现的简帛佚籍都使我们以往似乎已成定论的学术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第三，有助于古籍的校读，如校正文字、阐明辞义、文义等。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佚书，但与传世古籍有共同的内容，因此，它们都是可以用来校读传世古籍的极好资料。对于墓葬中出土的古籍来说，保留了更多的原本形状，避免后人的增删、附会和转抄错误，因而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更何况一部古书即使是伪书，也未必尽非，其中也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编造伪书必须要有历史素材，而不能完全凭空捏造，伪书中的某些内容可以成为研究伪书成书年代历史的资料。陈寅恪即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

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8]顾颉刚自己也说：“我们所以不能去伪书的理由：（一）用之已久，影响甚大；（二）用史的眼光看，作伪状况也是史；（三）可以考一个人或一种学说迁变的样子，可以知大家对于他的观念怎样。”[9]冯友兰也很精辟地指出：“所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列子》这部书，我们认为是伪书。说它是伪书，不过是说它不是先秦的著作。但它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所表现的思想，虽然不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大概也是魏晋时代的思想。……资料的真伪并不象一颗珍珠的真伪那样。说一颗珍珠是真是伪，那就断定了它本身的价值。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后。”

[10]

7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土了大批简帛佚籍，使我们对古籍的资料来源和成书过程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启发我们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考订方法的更新，因而能够得出大家比较公认的结论。出土的竹书帛书对研究古籍体例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1）证实周秦古籍往往不署作者名，并且只有篇名而没有总的书名。（2）证实古代子书大都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而不是或不纯粹是某一个人的著作。（3）证实古籍多单篇或部分别行。

（4）为不同的古书往往编入某些相同内容的现象提供了新的例证。我们可以根据考古资料与传世古籍对照，用来校勘、解读古籍，并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器物 and 遗迹研究古籍中提到的事物和制度。

（一）关于《左传》和《周礼》的新发现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能没有《左传》和《周礼》。没有《左传》，司马迁的《史记》很难成书，没有《周礼》，我们就无法研究西周的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但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左传》加以全面否定。康有为也认为古文经如《周礼》、《逸礼》、《毛诗》、《左传》等，无不是刘歆伪造依托的，甚至《史记》、《汉书》中凡有关古文经传的记载，也都是刘歆附益和篡改的。他对《国语》和《左传》的考订更为离奇，认为《左传》是刘歆从《国语》里割裂出来的，“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11]。崔适在《史记探源》一书中，凡《史记》有“古文”二字或与古文学说相同的，皆斥为刘歆或后人所篡改。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12]

古史辨派学者继承今文学家的余绪，一致认为两书或为伪作，或为晚出。钱玄同完全继承了康有为、崔适的意见，也认为《左传》是刘歆从《国语》割裂出来，伪造篡改而成的，他说：“《左传》是真书，但它本是《国语》底一部分，并非《春秋》的传。康长素底

《伪经考》与先师崔觐甫先生底《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都说《汉书·艺文志》有《新国语》五十四篇，这是‘原本《国语》’，刘歆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事改成‘《春秋左氏传》’；那不要的仍旧留作《国语》，遂成‘今本《国语》’。这话我看是很对的。……综上所述，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显然是将一书瓜分为二，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与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显出删改底痕迹了。刘歆把《国语》底一部分改成《春秋》的传，意在抵制《公羊传》。《汉书·刘歆传》‘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这就是他给《春秋》跟《国语》底一部分做媒人的证据。”[13]后来他又写了《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继续重申前说。

顾颉刚也说：“《左传》和《国语》固是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但做书人的态度既不忠实，并且他确是生在战国时的，这部书又经过了汉儒的几番窜乱，可靠的程度也是很低。

《仪礼》是记载周代礼节最详细的，但礼节这等的繁缛，物品这等的奢华，决不是‘先进野人’之风，恐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的出品。《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行最详细的，但谈及曾子的死，至少出于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也是战国初期的出品。《礼记》更后了，大部分是西汉人所作，这可以把汉人的记载证明的。”[14]又说：“刘歆当时在秘阁读书，见到了左丘明的《国语》，觉得它记载春秋时事十分丰富，大可作为《春秋经》的辅佐；又见许多零篇碎简的《逸书》和《逸礼》，觉得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材料，也可以作为《书经》和《礼经》的补遗。”[15]即使到了1966年，他仍然认为“《左传》的编写，乃是刘歆根据左丘明的《国语》，来写关于《春秋》的‘传’。”因此“《左传》，在汉代以前是没有这本书的。”[16]

杨向奎对这种极端看法，有过极为中肯的批评：“《古史辨》在冲破伪的古史方面，在由怀疑古史而加以抨击时都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以致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17]杨伯峻在仔细研究了《左传》本身和战国、西汉的流行情况后，也认为“它成书年代在公元前403年以后，386年以前”[18]。胡念贻对《左传》本身也作了透彻研究，从助词的用法着手，认为《论语》、《孟子》是用鲁国方言写的，称为“鲁语”。他说《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后人虽有窜入，但它还是基本上保存了原来面目”[19]。现在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器物铭文，多与《左传》所记人、地、事迹相合，如河南浙川下寺出土的楚令尹子庚鼎，子庚的职官、名、字，与《左传》所记完全相合，证实《左传》确为先秦古籍。

《周礼》原名《周官》，有时也称作《周官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部分，精心构思并详细叙述了周代的官制的结构和组织。但它是一部争议很多的书，汉代以来不断受到怀疑，宋人更是主张《周礼》为刘歆所伪造的。康有为认为“《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20]。梁启超也说《周礼》一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21]。

钱穆作《周官著作年代考》，列举祀典、刑法、田制、其它四个方面的资料，如“祀典”并未采及五帝四时分祀之说，多取战国晚年阴阳家的思想；“刑法”承李悝、商鞅什伍相收司连坐之法；“田制”则多半是战国晚年学者理想上的冥构；其他如封建、军制、外族、丧葬、音乐等，皆采战国时代的真实材料，论证《周官》成书于战国。[22]郭沫若写了《周官质疑》一文，依据青铜器铭文，列举金文中所见周初至春秋中叶所有22种各类官名，认定《周礼》是战国晚期的真文献，可能是晚周荀卿的一位赵国弟子编著的。[23]杨向奎也从《周礼》一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如历法、法令等），判定“《周礼》可能是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记载也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齐国的社会，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事实。”[24]顾颉刚利用《大克鼎铭》、《小克鼎铭》、《毛公鼎》、《矢令彝》、《师兑毁铭》和《扬毁铭》等青铜器铭文，修订了自己先前强调《周礼》出于刘歆伪造的看法，认定它是战国时代齐国以及别国法家的作品，他说：“因为这书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所以其中的制度常有牴牾和不可信的成分。然而其中也必然保存了一部份的古代的真制度（例如不用牛耕、没有铁器等事项），值得我们重视，所以需要细细地分析出来而部分地归到正确的古代史里去；就是说出于战国和西汉时代的人们的计划，那也应当分析出来而归到战国和西汉的政治经济思想史和宗教史里去。如果随手放过或随意屏斥则都是不应该的。”[25]

近些年发现不少周代青铜器的铭文，可以与《周礼》的记载相印证，如陕西周原出土青铜器裘卫四器，器主名卫，职官为裘，是为周王管理毛皮的，而“司裘”官名只见于《周礼》，无疑表明《周礼》的真实可据。刘雨根据两周青铜器铭文中的金文为主要资料，分为祭祖、军、封建、相见、乡燕、射等六个题目，细心联缀，试图复原“周礼”原貌。他说：“《周礼》一书是记录古代官制的，以天地四时配称六官体系。作者将古代官制纳入他主观构拟的整齐体系之中，人为划一的痕迹随处可见。但《周礼》中许多职官名及其职文却与西周金文相合，这说明该书作者在编辑此书时，是一定参考了许多今人见不到的先秦典籍的，绝非向壁虚造。《周礼》在记叙古代官制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古代礼制的内容，这些资料十分珍贵，当我们用金文鉴别后则可以加以利用了。”[26]刘起釭也认为《周官》一书，“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它录集自西周后期以来逐渐完整的姬周系统之六官官制资料，再加以条理系统以成书。不涉及姬周系统以外诸国之官制，尤与战国官制不相干。因为如果至战国时期，则人所周知的五行说已兴起，司徒、司马等原在《曲礼》中称‘五官’，它就正好与五行相配合以成《周官》一书，而不应采用周制原有之六官了。由这一点也可见《周官》绝非战国之世所编成，这也是可断言的。”[27]

实际上，《周礼》并非伪书，它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官制，也夹杂着战国时期有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周礼》的成书年代虽晚，但其中的记载并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可以与其它有关周代的文献资料，互通证明，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状。

（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

20世纪初年，诸子学勃兴，老子其人其书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所发起的疑古思潮，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名家大师纷纷加入这场讨论，结果形成二种不同的观点：一派以胡适、唐兰为代表的“早出论”，认为《老子》在春秋末年或战国早期就已形成；一派以梁启超、钱穆、冯友兰为代表的“晚出论”，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顾颉刚甚至持秦汉间说，他说：“《吕氏春秋》……的作者是肯引用书的，所引的书是不惮举出它的名目的。……《吕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词和大义这等多，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于是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28]钱穆意识到老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他说：“余尝谓老子之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但他考证后说：“据其书思想议论及文体风格，盖断在孔子之后。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并认为老子可能是楚人詹何，《老子》产生于《庄子》之后，《荀子》之前。[29]双方针锋相对，互相辩驳，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

胡适早在1931年就指出钱穆在考订《老子》成书年代方法上的错误，他说：“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这二千年中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30]因为思想线索最不容易捉摸，一个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线索去寻求。

学术研究的突破，只有依赖于王国维所说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印证而形成的“二重证据法”。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许多埋藏于地下的文献古籍相继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老子》一书的争论带来一线曙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甲乙两本，均抄写于秦汉之际，这使得《老子》成书文景之说说不攻自破，但仍不足以动摇“晚出论”所持战国中期说。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甲乙丙三组，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抄本。简本不分道经、德经，文句与传世本、帛书本各有异同，编次也判然有别，写作年代应当更早。一般来说，竹书的抄写年代应早于楚墓下葬时间。裘锡圭据此认为：“把《老子》形成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老子》确为老聃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编成，其成书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或稍晚一些的时候，下距郭店《老子》简的时代一百几十年。”[31]这就推翻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说法，可见老子确实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他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也应与儒家、墨家同时，在春秋晚期即已形成，这一判断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关于“老子”的考证，优点是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分别对待，缺点则是未能把“老子”思想的出现和文字写定的时代分别对待。关于“老子晚出”说的考证，大多只能证明《老子》的文字及定本晚出，并不能证实“老子”的思想晚出。远古思想很多先靠口语流传，后来才写成文字；越是远古的思想，靠口语流传的时间愈长，因此距离文字写定的时差也愈长。

（三）关于《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的争论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臆生阿、郢之间，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记载十分清楚，孙武和孙臆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各有兵书流传后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所说《吴孙子》即指《孙子兵法》，《齐孙子》为《孙臆兵法》。

但《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不见著录，因此自南宋以来，历代均有学者怀疑孙臆其人及兵法的存在，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按《左氏》无孙武，他书所有《左氏》不必尽有。然颖考叔曹刿烛之武 设诸之流微贱暴用事，《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阙略；……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3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也认为，“孙武事吴王阖庐，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何人也。”以其书为战国山林处士所伪托。清代以来，疑者日众，全祖望、姚鼐、章学诚也都撰文，申辩孙臆之人不存在。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0世纪以来，学者对这部我国最早、最精的古代兵书也作了详细考证。钱穆考证孙武“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又说：“疑凡吴孙子之传说，皆自齐孙子而来。《史记》本传吴孙子本齐人，而齐孙子为其后世子孙。又孙臆之称，以其臆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臆名耳。”[33]梁启超也说：“《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臆或战国末年人书。”[34]齐思和则说：“余详研其书，遍考之于先秦群籍，然后知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而叶氏之说为不可易也。”他经过对《孙子兵法》中所论之战术、用兵规模、军制、使用的名辞、其书之体例、学术发展之顺序等项逐一考证后认为：“所谓孙武者既未必真有其人，而十三篇所言之战术、军制，其中所有之名辞，皆系战国时物，而其著书体例，又系战国时代之体例，则其书为战国中后期之著作，似可确定。”[35]

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在《孙子辨》里，认为“孙武见吴王在吴伐楚之前，其时吴王已得见武之十三篇。然作书之时，越国尚小，其兵不应多于吴，今《孙子·虚实篇》云：‘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所以今本《孙子》作成年代应该在越强于吴之后。他又认为：“《左传》昭公十三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九地篇》云：‘吴人与越人相恶。’是在吴、越相讎之后之证。”综合这两条证据，他认为孙武和孙臆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武其名，而臆其号，而十三篇之作自然是战国时的孙臆。武内义雄更进一步认为，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是孙臆。[36]这种看法几成定谳。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年代约为西汉初年，内容包括《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孙臆兵法》等。新发现的《孙子兵法》13篇比经过曹操编辑的通行本更早，内容基本相似，也有一些在通行本没有出现的文本资料。这两部兵书的出土，澄清了笼罩在孙武、孙臆其人其书的迷雾，证实了孙武、孙臆的存在，并各有兵法传世。从简中还可看出，孙臆的著作是两书中较晚的，因为它提到《孙子兵法》，并对它的思想加以解释和扩大。此外，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中出土大批简牍，也有《孙子兵法》文本中的一些段落，但与传本有一些不同。郑良树根据地下出土资料所引及《孙子》文字来考察，认为春秋末年及战国早期，社会变动非常剧烈，动辄十万兵队，数年的战争，不会没有的，并认为军制、战术等都是长期性的孕育和演变，春秋末年战国早期未必不是它们孕育的开始，何况军事家们对这些战术、名词等，都比常人更会有敏锐的“先知”。以《孙子》战术、军制及名辞的时代性来断定其著作年代，成就固然可观，不过，由于春秋末期及战国早期社会变迁的时代分界线客观上不是完全截然不分的，由此而作出的推断，也就显得稍微薄弱了。因此他认为：“《孙子》十三篇作成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末年，战国早期（战国始年以《史记》为准），也就是大约孙武卒后的四十余年间。”[37]

《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杨）生贵己，孙臆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可见孙臆作为兵家，与孔子、墨子齐名，在思想界有广泛影响。但东汉人高诱却注曰：“孙臆，楚人，为齐臣，作《谋》八十九篇，权之势也。”把孙臆的籍贯由齐换为楚，已经不甚清楚了。同时从曹操注《孙子兵法》13篇未论及孙臆来看，很可能在东汉末年，《孙臆兵法》已成为佚书了。简本《孙臆兵法》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孙臆对孙武的兵法又有所发展，不仅篇幅多，而且在战争和战术的论述上也有特点。关于其作成年代，杨伯峻分析道：“我认为《孙臆兵法》的编定，和一些先秦的其他古籍一样，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自然，也不必排斥这样一种推断，即《孙臆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臆的原著，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但无论如何，编定的年代，当在孙臆死去以后了。”[38]

（四）《文子》的真伪之争

《文子》是一部有争议的书，《汉书·艺文志》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周平王与文子非同时人，因此班固说其“依托”。但《文子》中“平王”前并未见有“周”字，若如前人所言，“平王”应是“楚平王”，则为同时人，那么《文子》就不能算作“依托”之作了。唐人柳宗元《辩文子》称：“《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认为可能有后人增益，或“众为聚敛以成其书”。[39]柳宗元指出《文子》驳杂，非原本，但没有说完全是伪书。宋人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认为今传本《文子》不少内涵不合于周平王时代，有的甚至要晚到秦世。后世学者大都以今传本《文子》是伪书，故清儒校理诸子，鲜及是书；而历代传刻，亦无善本，以至于没有一本好的《文子》注本。

近代以来，学者承袭前说，也认为《文子》一书为伪书。如章太炎在《菴汉微言》一书中说：“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40]

胡适在《淮南王书》中说：“又有《文子》一书，相传是老子的弟子所作，内容往往与《淮南王书》相同，故清代学者多用来校正《淮南》。但《文子》实伪书，只可算是一种《淮南》节本，不过因节钞还在前汉时代，故往往可供学者校勘之用。”[41]他认为《文子》是伪书，为《淮南子》一书的节本。

1973年，马王堆帛书发现《老子》卷前佚书，唐兰以佚书与传世诸子比对，写了一条附记：“《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先秦古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如《六韬》之类，过去都认为后世伪作，近西汉墓中所出古籍，证明很多是西汉初已有的古籍。《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42]但这只是推测，没有确切的证据，直到在八角廊汉简中发现了《文子》，才扭转了学者对《文子》一书的想法。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一座西汉墓葬（时间为汉宣帝元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被指为伪书的《文子》残简，与《汉书》所说相同，也与今本《文子》相似，只是今本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而已。根据今本《文子》，定州汉简属于《道德篇》的有1000余字，另外少量竹简文字与《道原》、《精诚》、《微明》、《自然》中的内容相似，还有今本《文子》不见的佚文。整理者认为竹简《文子》与《汉志》所述相同，“从几个与今本相同的章节证明，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文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43]。

将竹简本与今传本《文子》比较后可以看出：（1）汉简《文子》与今本《文子》，有汉简《文子》中有的内容而今本无，有今本《文子》中有的内容而汉简《文子》无，说明两者均不是原完整本。从今本《文子》的内容看，后人在残缺不全的《文子》中，加进一些内容是可能的。（2）汉简《文子》中无“老子曰”，而是平王和文子之间，即君臣之间的问答。今本《文子》除极个别处保留有平王问文子答外，基本是文子问老子答，也即是师生之间的问答。这无疑是后人望文生义加以窜改的。（3）在汉简和今本《文子》内容相同的部分中，今本《文子》中似乎有后人训释的东西变为正文。（4）今本中有在原本上附加衍文并窜改原文之处。（5）今本《文子》中窜乱的地方很多，如简本是平王和文子问答中逐个说明的问题，而在今本中却是由老子混讲在一起等。（6）汉简内容包含在今本《文子》一些相似的言词中，反映两种本子的不同。[44]

定州汉简的发现，虽为残本，却说明汉初已经有了《文子》的存在，“理道深至，笔力劲练，非周秦间人不能为”，李学勤说：“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45]今本虽经后人做过较大的改动，但仍保留了不少汉代本的实质性内容，不能简单地视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

注释

[1]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7页。

[2]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2），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3]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见《顾颉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4]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1页。

[5] 余嘉锡：《古书通例》，见《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267页。

[6] 李零：《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见《李零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2—57页。

[7]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第79—85页。

[8]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

[9] 顾颉刚：《伪书不能废》，见印永清辑《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1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2页。

[11]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页。

[12]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13] 钱玄同：《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见《古史辨》第一册，第278—279页。

[14]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见《古史辨》第三册，第311页。

[15]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自序》。

[16] 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17] 杨向奎：《论“古史辨”》，见《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

[18] 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见《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25页。

[19] 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见《文史》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20]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6页。

[21]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演录二种》，第233页。

[22] 钱穆：《周官著作年代考》，见《燕京学报》第11期，1932年，第1—59页。

[23] 郭沫若：《周官质疑》，见《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9—81页。

[24] 杨向奎：《〈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时代》，见《山东大学学报》1954年第4期。

[25]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见《顾颉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

[26] 刘雨：《西周金文中的“周礼”》，见《燕京学报》第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7] 刘起釪：《〈周礼〉真伪之争及其书写成的真实依据》，见《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42页。

[28]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时代》，见《古史辨》第四册，第

462—519页。

[29] 钱 穆：《先秦诸子系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4、223页。

[30] 胡 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见《胡适文存》（四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77页。

[31] 裘锡圭：《郭店〈老子〉初探》，见《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页。

[32] 叶 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75页。

[33] 钱 穆：《先秦诸子系年》，第12、262—263页。

[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

[35] 齐思和：《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见《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9、225—226页。

[36] 转引自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3页。

[37] 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年代》，见《竹简帛书论文集》，第72页。

[38] 杨伯峻：《孙臆和〈孙臆兵法〉杂考》，见《杨伯峻学术论文集》，第193页。

[39] 柳宗元：《辩文子》，见《柳河东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8页。

[40] 转引自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41] 胡 适：《淮南王书》，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2页。

[42] 唐 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见《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88—189页。

[4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见《文物》1981年第8期。

[4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的整理和意义》，见《文物》1995年第12期。

[45] 李学勤：《世纪之交与学术史研究》，见《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29页。

出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责任编辑: echo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平均得分 0, 共 0 人评价

1 2 3 4 5 6 7 8 9 10